

# 从东西矛盾到西方与多元文明的矛盾

——对当今世界基本矛盾的一种理解\*

周建明 焦世新

**【内容提要】**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是冷战时期的基本矛盾。冷战结束后,随着南北矛盾的继续发展以及东西矛盾的下降,这两组矛盾不再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基本矛盾。在后冷战时期,西方文明与多元文明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其主要内容就是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与基于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坚持自己发展道路的冲突,同时也表现为霸权主义和反霸的冲突,并深刻地影响着南北矛盾的发展。在当今世界,代表进步、文明、民主的潮流是以多元文明为背景的各个国家的相互尊重以及各国间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而强行把西方意识形态、制度和道路“普世化”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世界进步的绊脚石。

**【关键词】**世界基本矛盾;东西矛盾;文明冲突;和谐世界

**【作者简介】**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焦世新,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20)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8)06 - 0021 - 08

正确认识和判断世界基本矛盾是认识时代特征与国际形势的基础,也是我们制定对外政策和做好对外工作的前提。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它的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图对此做出一些探究和分析,使我们在认识世界和处理对外事务时能有所裨益。

## 一 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 ——从冷战谈起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当今世界与冷战时期一样面临着“求和平,谋发展”的两大基本任务。对于冷战时期的世界基本矛盾,邓小平曾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矛盾与南北矛盾交织在一起贯穿整个冷战时期,虽然其性质和形式发生过变化,但这两对矛盾始终是决定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基本矛盾。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批评和修改意见,当然,文中错漏由作者承担。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东西矛盾最初表现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东方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阵营之间的对抗和竞争。20世纪70年代则主要演变为美苏争霸。在美苏都持有可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条件下,东西矛盾虽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但冷战的形式以军备竞赛、军事上的相互威慑、经济上以削弱对方实力的对立、地缘政治上对势力范围和中间地带的相互争夺与对抗等形式表现出来。尼克松很明确地把这种冷战称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南北矛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在上述任务基本解决之后,南北矛盾又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争取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争取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要求缩小南北差距,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并没有好转。因此,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冷战结束以后,南北问题仍在不断发展,但东西矛盾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影响世界格局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东西矛盾依然存在,它突出地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如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之间的矛盾。由于中国、越南对经济体制实行了改革,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度彼此加深,甚至在外交上相互借重的程度也在增加。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东西矛盾已不再是决定整个世界格局的基本矛盾。

然而,冷战的结束与东西矛盾的下降并没有导致世界变得更加稳定与和平。在今天的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某些国家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矛盾、美国与伊朗因核问题而形成的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加上近年来又重新尖锐起来的美国、欧盟与俄罗斯的矛盾、美国和西方国家与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左翼国家的矛盾,此外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的矛盾等,这些矛盾此起彼伏,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世界局势,并成为冲突、对抗甚至局部战争的根源。这些矛盾与冲突无论从世界力量的多极化,还是从南北矛盾、东西矛盾的角度都无法给予充分的解释。笔者认为,上述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矛盾是东西矛盾在冷战结束

以后的转化与发展。说它是转化,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始终没有放弃把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普世价值”来改造整个世界的企图,因而与非西方文明的国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生着冲突,特别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所鼓噪的“建立美利坚帝国”论调就是这种趋势发展的突出体现。说它是发展,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这是我们认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它提示我们,多极化与霸权主义的矛盾以及南北矛盾并不能全面概括目前影响世界局势的基本矛盾,只有把多极化与霸权主义矛盾和南北矛盾置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

## 二 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与东西矛盾的演变

文明包含着文化,通常被看做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影响着文明内部的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它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在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看来,文明有两个不同的含义,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常译译:《真正的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冷战后,美国一直存在关于“帝国”的论调,在2000年的时候,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就已经出版。2002年初,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在他主编的《世界秩序的重组:九一一事件的长期影响》文集中发表了一篇论述“后现代国家”的文章,全面阐述了其“新帝国主义”的理念。2002年4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以《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为题刊登了此文的摘要,帝国的论调开始流行。此外,美国的《每月评论》杂志于2002年11月号刊登了约翰·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题为《重新发现帝国主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错误的,美国国内的学者纷纷著文附和,“新帝国论”在美国国内成为主流。伊拉克战争也使许多人认为这是“新帝国”的论调在现实中的回应,这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中国也产生了有关帝国的大量论文。不过美国政府的官员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则,一直没有在官方的话语中使用“帝国”的论调。

Adda B. Bozeman, "Civilizations Under Stress,"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Vol. 51, No. 1, 1975, p. 1.

一是与野蛮相对应;二是特殊的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的历史整体。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将文明视为文化领域,认为文明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文明与文化有所区别和紧密相连的关系使得将文化作为定义文明的主题,这在文明的研究中存在着广泛的共识。由此可以认为,西方文明就是最广泛的西方文化实体,包括世界观、价值、制度等。它既影响了西方文明内部的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本文所指的西方文明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在冷战中作为西方阵营的国家所秉持的世界观、价值和制度理念。文明作为文化实体,是孕育政治意识形态和文明内部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土壤。

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任何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仰都产生于特定的文明或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是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它们来自社会公认的观念的架构。文化不仅产生意识形态,而且可以支撑或抑制意识形态。从另一个角度说,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其核心的价值观、思维、信仰和政治社会制度等,西方文明也是如此。亨廷顿将其概括为古典遗产、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制度、个人主义等。正是这些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培育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中,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市场、人权、个人主义等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意识形态。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之处正是这些价值观与体制的独特性。

西方意识形态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就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而进行全球扩张,成为决定世界发展和世界局势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西方文明首先实现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并通过武力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而引起其他文明的回应。而且,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明抱有强烈的“普世主义”——要用自己的信仰来改造世界的强烈信念。“白人的责任”、“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天定命运”的宗教使命感等都是这种“普世主义”的表现。西方世界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非西方国家应当认同并接受西方的优越价值观,按照它们的体制,采用它们的发展模式。“用规范的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在“普世主义”本性的驱使下,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世界常常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文明的国家。整个世界近现代史在某种程度就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扩展自己势力范围和影响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对此做出回应的历史。

冷战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及其“普世主义”的特殊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异质文明的、拥有强大实力的意识形态对手。在经历了西方内部冲突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不得不联合起来,应对来自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挑战。可以说,东西矛盾的基本特征就是美苏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竞争。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第一次感受到了威胁,乔治·凯南的“长电”、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等处处闪现着要捍卫以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宣示,冷战由此而拉开序幕。在冷战中,美国对待发展问题和南北矛盾同样表现出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情结。

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大批独立,美国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做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它将美国和西方自身的发展模式作为终极模式,力图将第三世界引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削减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和必要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体现了知识分子、官员乃至美国公众的各组成部分所共有的、内涵更深刻、渊源更久远的一整套文化假设”。所以,西方话语中的现代化道路其实是美国自身发展的模式总结,这种模式无疑也是根植于西方文明。我们并不否认,世界力量对比、地缘政治等因素也是推动冷战及东西矛盾的根源,但意识形态无疑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失去了东方阵营这个对立面,但是西方文明的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前言第13页。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 p. 12

[美]迈克尔·H.亨特著,褚律元译:《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63页。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8页。

[美]雷迅马著,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普世主义”本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西方国家更加坚信自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优越性,“普世主义”得到进一步张扬,甚至认为西方将经历“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在西方的一些人眼中,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世界规定了最好的前景,冷战作为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最终以苏联解体而告终,这意味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会借此进一步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推广到更广泛的世界上去,其目标不仅包括现在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还包括前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和原来不属于东西方阵营的“中间地带”。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了。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它与冷战中只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不同,这次是力图要进行对世界上非西方文明的全面改造。其中,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其对抗性出现了弱化,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下降了。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可以印证这样一种判断。冷战刚结束的时候,恰逢中国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国一度遭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制裁和施压,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冲突的焦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表现为东西矛盾的延续和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奉行非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政策和避免与西方国家对抗的策略,中美之间并没有爆发新的冷战。1994年克林顿宣布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去中心化与东西矛盾淡出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同步。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接触”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美国旨在用军事威慑和接触两手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塑造中国的行为和意图。美国的这种“接触”政策虽然在主观上有遏制中国的意图,但是在客观上与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具有相容性,使中美构建“建设性的关系”成为可能。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改善标志着东西矛盾的弱化。虽然中美之间以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基本制度为驱动的冲突因素仍然存在,双方仍然相互防范,但在“东”和“西”意义上的矛盾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没有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更没有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主要

因素。相反,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安全上的相互倚重却不断发展,以至于美国视中国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像越南通过“革新开放”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或像朝鲜、古巴仍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但它们之间矛盾的焦点是国家安全,而非意识形态。由此,后冷战时期的东西矛盾已不再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民族的东正教文明以及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则日益突出,成为国际关系中突出的问题。

毋庸置疑,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驱动力仍然是西方文明及其意识形态的“普世化”。美国克林顿政府“接触战略”的逻辑是,“当民主和市场在其他国家占据统治地位时,美国将会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和更加有影响力”,而信奉新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上台后则主张“20世纪自由和极权主义之间的伟大战争,是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并昭示了可维持的国家成功模式的唯一选择:那就是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强力推行“民主化改造”成为实施这种战略的重要路径。一方面,美国借助反恐战争来进行“政权更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先是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将自己的民主模式植入阿富汗;接着又于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提出了改造中东和北非的民主化计划,试图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模式来改造伊斯兰世界。另一方面,美国的布什政府还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来推行民主。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都是美国一手策划的对独联体国家的“再西化”。之后,美国将输出民主价值观战略的触角伸向东南亚,2007年美国借助缅甸国内的民生危机,企图在缅甸挑起一场“藏红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16, Summer 1989, p.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

虽然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提出同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这个提法并没有延续性。然而,中美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则一直延续到现在。

参见刘金质:《试论克林顿政府的扩展战略——一年来美国外交的回顾和展望》,载《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第47~49页。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2/>.

色革命”。随后,美国又在马来西亚国内的族群矛盾和国内游行中扮演了幕后策划者的角色。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直言不讳,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明确表示在全球推进民主是美国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是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这个世界上的“暴政”。美国将西方价值的“普世化”与全球战略结合起来,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对非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而且对中东国家搞“民主改造”,在军事上搞“国防转型”,美国从西方价值观的“普世化”出发走向新帝国主义。伊拉克战争后,世界上掀起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新一轮争论。

美国“新帝国主义”并不像传统的帝国主义那样只限于用军事和资本手段来实现利益的扩张,而且其重要特征是力图通过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它突出地表现在布什政府上台之后,正式采取了一种帝国姿态,即追求绝对军事优势,以激进的宗教为基础的政权政治,要在世界上消除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实现对石油的控制和用金融手段对财富进行掠夺。这种被称为“布什主义”的价值观摒弃或重新阐释了许多支配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方式的重要原则。作为新的帝国主义,美国不仅实行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强行对其他国家的政权进行更替,其目的是要长久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且要按照美国模式重建世界。这实际上是美国把西方文明作为“普世主义”来强行推广。一旦把西方文明当做“普世主义”,正如亨廷顿所说,“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虽然十年前亨廷顿就意识到,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的战争;同时,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文明的失败,这可谓是西方文明的自知之明。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缺乏自我约束的要素,美国还是在21世纪走上了力图把西方文明“普世化”的帝国主义道路,最终给自己制造出众多的对立面。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由来已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

的真正信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弱势的伊斯兰世界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也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探索充满挫折,特别又处于西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压迫之下,因而产生了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反美主义等各种理念。<sup>⑩</sup>此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一直怀有敌意,认为伊斯兰政治运动无一例外地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威胁,基本上都是反西方、反民主、反自由、反和平和反现状的,而且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sup>⑪</sup>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对伊斯兰世界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温和政策,避免文明的冲突。<sup>⑫</sup>但九一一事件最终使得美国与伊斯兰文明的矛盾激化。恐怖主义取代莫斯科变成美国全球性的敌人。<sup>⑬</sup>对美国人来说,伊斯兰主义已经代替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看成相似相连的思想体系,它们分别在20世纪以来的二战、冷战、冷战后等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国构成了最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sup>⑭</sup>从本质上来说,美国的反恐战争是一场西

刘建飞:《从“颜色革命”看美国推进民主战略》,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8期,第41~43页。

[美]M. 华尔兹著,于海青摘译:《存在一个美利坚帝国吗?》,载《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43~46页。

参见周建明:《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十三章。

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6

[美]伊沃·H. 达尔德尔等著,刘满贵译:《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英]瓦西利斯·福斯卡斯、[英]比伦特·格卡伊著,薛颖译:《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战争和以血换石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179页。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9页。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9页。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32页。

<sup>⑩</sup> 参见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

<sup>⑪</sup> Robert Satloff *U. S. Policy toward Islamism: A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Overview*,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2000, p. 3

<sup>⑫</sup> 尼克松认为,“如果西方与穆斯林的关系处理不当,‘文明的冲突’可能就是西方与伊斯兰的对抗。……美国决不能让‘文明冲突’变成后冷战时代的特点”。参见 Richard Nixon, *Beyond Pea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157.

<sup>⑬</sup> Peter Waldman, “A Historian’s Take on Islam Steers U. S. In Terrorism Figh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3, 2004

<sup>⑭</sup> 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第196页。

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冲突,布什称之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战,而本·拉登则应战道,“伊斯兰反对基督教犹太人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由‘大十字人’布什在十字架的旗号下所领导”。双方都从各自的宗教和文明话语体系来寻找对抗的合法性。美国“大中东计划”包含很多利益目标: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实现在中东的长期驻军、防止伊朗和伊拉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最深层次的出发点就是通过西方的民主来改造伊斯兰文明。按照这个计划,美国第一步首先要改变伊拉克政权;第二步是实现阿以和平;第三步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和自由。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正是美国改造伊斯兰文明的第一步。伊拉克的局势表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行的“民主化改造”已陷入骑虎难下之势;伊朗核问题反映了这两种文明的冲突难以妥协;阿以冲突则显然已成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烈度的晴雨表。上述因素都说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已经成为牵动整个世界局势的矛盾之一。

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近年来也呈现出尖锐化的趋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并试图使自己成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员。然而,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把俄罗斯看做是“自己人”,通过北约东扩和欧盟的扩大等战略紧迫措施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俄罗斯国力衰退的时代,西方国家可以接纳俄罗斯加入“7+1”的机制,但当普京为了重振俄罗斯而采取了打击金融和石油寡头、抑制地方势力、控制国内舆论、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防止西方势力渗透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后,美国不仅指责俄罗斯在民主化上倒退,而且还把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在独联体国家大搞“颜色革命”,并通过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肢解了斯拉夫民族的统一性,也断绝了俄罗斯作为欧亚帝国重新崛起的可能。美俄冲突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像俄罗斯那样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在制度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却仍然不能接纳,而要置其于不得翻身的地位呢?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文明的冲突。早在1946年乔治·凯南的“长电”中,就把苏联的威胁归结为是来源于俄罗斯传统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结果。凯南认为,俄罗斯民族本能地具有不安全感,它产生于一个和平地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上的农作

居民与一群凶暴的游牧民为邻的结果。当俄罗斯与经济发达的西方人打交道时,产生了新的恐惧,为了求得安全,它们学会的只是如何彻底地置对手于死地,从没有考虑与对手建立契约和妥协。当苏联解体、俄罗斯彻底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在西方人眼中,这个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国家由于基于其传统文明,仍会走上像沙俄帝国或苏联扩张的老路,必须使俄罗斯始终保持弱势。因而当普京力图用民族主义作为其振兴的旗帜并有可能借此而重新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再次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威胁”。它们认为,这次要对付的是沙俄帝国的复活,而不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

当今世界的另一个新的冲突点在西半球,即美国与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左翼国家间的冲突。拉丁美洲一向被美国看做自己的后院。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普遍遭到失败后,一些国家开始向左转。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国内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即向大多数贫苦民众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的改革被称为“玻利瓦尔革命”。而且,查韦斯还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公开支持拉美地区的“左派”力量。查韦斯执政后,拉美地区先后又有卢拉、基什内尔、巴斯克斯等“左派”领导人分别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执政,拉美地区的“左倾化”引起了美国的极大担忧。美国与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国家的矛盾实质是关于西方文明模式在拉美是否有普适性的冲突,这种矛盾随着“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的破产、拉美国家试图摆脱西方模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将不断深化。在这种矛盾的背后,依然是基于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的冲突。

Osama bin Laden Statement, broadcast by Al-Jazeera and reported by the Dubai bureau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on Monday, September 24, 2001.

Philip H. Gordon, "Bush's Middle East Vision," *Survival*, Vol. 45, No. 1, Spring 2003, pp. 155-160.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335页。具体参见其中关于乔治·凯南的《长电》的译文。

王鹏:《查韦斯执政以来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载朱鸿博等主编:《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156页。

中美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东西矛盾的成分,也有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霸权国家与一个新兴大国的矛盾,更有源于不同文明而导致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矛盾。今天的中美关系已不是冷战时期的东西矛盾的简单延伸。中美之间既有根深蒂固的对立,也有利益的相互依存和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借重。然而,当关注中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时,我们发现中美矛盾的根本点在于中国的道路。中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日益成为挑战西方现代化和全球化模式的典范,对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在客观上形成挑战。中美关系从力量上表现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与超级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从观念上则表现为带有中华文明和文化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基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构成了中国软力量的最大来源,美国白宫前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曾指出:“美国和中国代表着不同的全球发展模式。随着中国的发展给人留下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北京希望也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也发展其软实力,或称榜样的力量。美国自90年代早期以来一直在兜售所谓‘华盛顿共识’。相比之下,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正在被称为‘北京共识’。只要华盛顿认为北京支持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中国意图和潜在冲击的猜疑就会加剧。”说白了,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成功,也就打破了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的神话,这不仅会使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的信念破灭,也将从根本上动摇西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美文明的文明背景将会更加明显。它将证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基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必将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各种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平等相处,合作发展要远比西方文明独霸的世界更符合历史的规律。

如果我们从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背景下来看待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民主战略,看待美国与西方同伊斯兰世界、俄罗斯、拉美左翼以及中国等之间的矛盾,我们更容易理解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本质,这就是用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来改造世界。这一点在美国对待转型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中也普遍存在着。

### 三 西方与多元文明的对立: 世界的基本矛盾

美国“新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及其“普世主义”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矛盾的产物。冷战时期的东西矛盾正越来越成为这个矛盾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在逐渐被其所替代。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与多元文明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的基本矛盾。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基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作为普世模式来强行推广,希望能维持它们的中心和主导地位,维护它们的霸权优势和有利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非西方文明国家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却被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边缘化,构成了两者之间主宰与反主宰、剥夺与反剥夺、排斥与反排斥的冲突,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南北矛盾的加剧正是与这种背景有关。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可避免地将南北之间的发展问题与推行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常常以援助为诱饵,对南方国家采取干涉、制裁等多种方式迫使它们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它表明西方文明的霸权地位和所采取的“普世主义”与非西方文明寻求平等民主的国际秩序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已经取代了东西矛盾,成为影响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基本矛盾。西方文明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的核心是力图将世界的发展置于西方模式的轨道。所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实质就是要把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

反对霸权主义也就意味着反对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保护自己的文明不被西方文明所吞噬。伊斯兰文明的反应是如此,近年来俄罗斯、拉美左翼国家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日益紧张,其基本原因也是这些国家要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不

《美资深专家李侃如:美国为何对中国感到不安?》,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115/hpdl/txt/2006-01/25/content\\_6104768.htm](http://www.china.com.cn/zhuanti/115/hpdl/txt/2006-01/25/content_6104768.htm),

再一味追随西方。对中国来说,反霸就是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基本制度,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

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中华文明既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又具有包容性。在外交上,体现这种文明精神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观上,就是“天下观”。中国的“天下”概念则囊括了整个世界的全部,包括物质和意识。从天下的立场出发,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天下的一部分,所以“心中无外”就能够从世界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这种文明在世界观上既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和利益的多元化,即“天下无外”,也强调多种文明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即“和衷共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就体现了这种世界观。“和谐世界”是对国与国、文明与文明的关系在世界观上的表达。它在政治上的表述是,我们要“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很显然,这是一种与具有“普世主义”冲动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世界观。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显示其生命力的同时,中国所主张的多种文明和平共处的和谐世界也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未来的世界究竟是走向文明的冲突,还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关键取决于占据着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态度,也取决于中华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能否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并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 四 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不可阻挡的趋势中,源于西方文明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强行推行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基本制度使得其与源于不同文明的各个国家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发展的矛盾正在全面展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军事上,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力图保持绝对优势,对走不同道路的国家进行威慑、胁迫甚至战争;在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通过施压、扶持代理人、接触的方式来改变那些非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权和发展方向;在经济上,西方国家通过制定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金融手段来造成不平等的发展环境,获取不对称甚至不正当的利益;在文化上,通过所掌握的学术上、政治上的话语权,对非西方文明国家进行渗透、宣扬西方意识形态,为“颜色革命”创造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西方国家为追求自己的目的不惜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稳定,甚至使他国的人民蒙受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坚持走自己发展道路的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的主权,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选择,在经济上争取公平的发展机会,在文化上争取自己的话语权等举措成为当今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内容,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替代了冷战时期的东西矛盾,也深刻地影响着南北矛盾和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代表进步、文明、民主的潮流是以多元文明为背景的各个国家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而强行把西方意识形态、制度和发展道路“普世化”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世界进步的绊脚石。可以预言的是,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的条件下,随着多极化的不断发展,一个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在21世纪必定会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

[收稿日期:2008-02-19]

[修回日期:2008-04-28]

[责任编辑:赵远良]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参阅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载《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 Abstracts

### **Emerging Powers' Strategic Options on Transitional International System**

**Yang Jian'an** (6)

The rise of the emerging powers mark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phase of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these emerging powers advocate th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fairness, rationalities,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multilateralism. They are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wards pluralism and multi-major-actors in the respects of power co-relation, organization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and common agenda. In an era with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its main them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in transition through peaceful, incremental and crisscross ways and the emerging frameworks are being multi-polarized, multilateral, consultative, bargaining and rule-based. However, this transition is still fragile and even subject to retrogression and reversion under the compound effects of multi-negative factors. With the emerging powers' rapid growth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s and gradually enhanced rights of discourse, their strategic options on international system will decide, to certain extent, whether and how to achieve a system of pluralism and multi-major-actors.

###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nd Its Impact on Sino-US Relations**

**Wei Hongxia** (13)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witnessed a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cross East Asia. The multilateral approach has gained a momentum to help settl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or bind the relation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pproach has played a role of holding dialogues and consultations, shaping opin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on each other, breaking ice when in crises, allaying suspicions or hostilities, winning favor or confidence, enhancing mutual trust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competence and contention between the two big powers and the clinker-built regional or sub-reg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made the Sino-US relations more intricate. Therefore, China should ful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multilateral framework in East Asia to guarantee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reven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getting more complicated.

###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World: From East-West to Western Multi-Civilizations**

**Zhou Jianming Jiao Shixin** (21)

The East-West and South-North Contradictions were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Cold War. Af-

ter the Cold War,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Western and multi civilizations have become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world. The conflict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ls between the West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clash of hegemony and anti-hegemony, have deeply affec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North-South contradictions. In today's world,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should be the trend in striving for progress,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cy, while the hegemonic univers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ideologies, regimes and development path would only ob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 **Atomism is the Ont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Democratic Peace” in Collusion**

**Shi Zhiyu Yin Wei Guo Mingjie (29)**

This paper is a response to Alexander Wendt's appropriation of the quantum theory in his social constructivism. By tracing the failure of realism and liberalism in explaining contemporary IR and exposing the amorphous affective component of epistemological Nation State, the authors discover the point of collusion between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peace.

###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Asia**

**Satosi Amako (3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has always been a focal point of IR schola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ism-regionalism-globalis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nationalism was only a tractor of Asia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fter World War II, many leaders of the Asia newly emerging countries who sloughed off from colonization rule tried to construct modern nation-states and encouraged the nationalism from a top as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al goal in order to fost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resi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East Asian communit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sian regionalism, was discouraged by the rising nationalism of many countrie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o build and properly handle nationalism, countries should enhance the formation of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a more open nationalism.

### **Japan's Global ODA Strateg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Feng Jian (50)**

ODA is one of the assistances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provide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ts main objective i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of the recipients. But for Japan, ODA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fficient diplomatic means to achieve political ends. Through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nalyses and systematic measurement of global ODA data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Japan's global ODA strategy has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namely, to strengthen its dominance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ensure the safe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rade transportations, and increase its influences in